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共产国际与中国
革命的关系**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 中国革命的关系

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
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 编

※ ※ ※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成都市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师范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6千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统一书号：11404·7 定价：1.00元

编 者 的 话

为了推动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研究，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支持下，1986年5月中旬由四川省党史研究会主持召开了四川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共收到论文四十一篇，从中选择了十五篇，汇集成这个集子。由于篇幅有限，有二十六篇论文未选入，只好在书后附录上加以标明。本书由乔毅民、徐正明主编。由于编辑时间紧迫，编辑水平又低，可能许多好文章应当选入而未选入，已选入的也可能删节、改动不当，欢迎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四川省党史研究会

目 录

对中共“六大”的再认识

……朱 铃 高强 何云安 邓介曾 张先智 (1)

李立三的错误与共产国际……………彭 塞 (8)

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产生的国际根源 (摘录)

……………邓寿明 王 丹 (23)

应当充分肯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

……………李尚贵 崔成明 (29)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

土地革命中的失误……………乔毅民 刘 琦 (35)

共产国际、苏联与西安事变……………李 军 (55)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与共产

国际的关系……………王廷科 (69)

共产国际与福建事变失败的原因初探

……………王西林 江红颖 (80)

在中国富农问题上共产国际的公式化和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突破……………管文虎 (93)

共产国际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知识分

子政策……………朱文显 (116)

“四·一二”政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吗?

(摘录)……………施巨流 (134)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过火斗争

原因初探.....	吕伟利(140)
共产国际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刘宗尧(144)
共产国际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郭生春 马善思(167)
周恩来正确处理共产国际、苏联与	
中国革命关系的立场和艺术.....	魏明生(175)
附录.....	(184)

对中共“六大”的再认识

朱 铃 高 强 何云安 邓介曾 张先智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对于“六大”问题的研究，在过去发表的有关论著中，比较多地论及了“六大”的正确方面，指出它确定了现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等，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认为，在肯定“六大”上述的这些正确方面的前提下，认真地指出“六大”存在的严重错误也是必要的。我们可以从“六大”的错误中找到第二次、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历史渊源。

（一）党的“六大”在分析革命形势时，首先分析了世界革命发展的形势，共产国际提出的冒险主义的“第三时期”理论，已经出现于“六大”的决议中。过去人们往往认为，“第三时期”理论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来的，其实，在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里，就集中论述了“第三时期”理论。决议案的第一段第一句话就说：“最近十年之间，世界革命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的直接革命行动时期，在这一阶段内，发生了十月革命，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西欧各

国，包括德国、意大利、奥国、匈牙利等都有激烈的革命危机；第二阶段，是暂时的局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稳定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都已经恢复或超过了战前的水平线，资产阶级广大地进攻无产阶级；第三阶段，是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结束，极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时期。在世界革命的第三期，“重新要有工人阶级公开的决定胜负的发动，要有殖民地底武装起义”，“要有极巨大的、具有世界的历史意义的事变到来，它的性质将要是极剧烈的阶级冲突”，而且是“必不可免的”。“第三时期”理论的最主要错误在于对第三阶段的世界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

“世界革命第三期底特点是：工人阶级底向左化和革命化，东方殖民地几千万的群众起来参加进攻帝国主义的斗争……”，“国际帝国主义整个系统之中巨大的主要的矛盾也日益剧烈起来”，“以至于有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第三时期”理论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发明，而是在布哈林给“六大”所作的长篇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

从上述“第三时期”理论的进攻路线出发，“六大”在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时，不能不带有“左”倾色彩。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六大”虽然承认工农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完结”，“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即目前还没有出现全国范围的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但“六大”却不愿意承认革命处于低潮，更不愿意承认革命需要暂时的退却。“六大”反复强调：“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新革命高潮之最初的薄弱的征象，已经可以看见。最先可以说的，便是经济斗争的群众罢工已经

有复兴的现象”，这是因为“有几种主要的动力，足以促进并加紧新的高潮之到来”。又说：建立工农革命军，“可以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底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从这种革命形势出发，“六大”规定了中国革命当前的实际任务。决议案一方面指出：“反革命底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暂时武装起义在全国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的口号”；另一方面又说：

“将来的新的高潮，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起义，以至实行武装起义，认做当前的实际任务，——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

“六大”对革命形势的不切实际的估计，根源于共产国际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而且是本决议案的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时指出：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但是，“许多朕兆，都指示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党的政治路线，“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这一高潮，必须要党起来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之直接的策略任务，……”。这就是说，共产国际所强调的是中国革命正在走向高潮。

（二）“六大”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时，一方面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

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这就是说，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既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也不是“不断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分析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又指出：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这就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此外，还要反对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又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非打倒不可。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实际上否定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

（三）“六大”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分析时，指出：

“城市领导作用底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底高潮，都将要表现它决定胜负的力量。”又说：“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这就是说，六大仍然坚持“城市中心”的革命道路，坚持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成功，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唯一出路。这同党内第一次“左”倾错误是一致的。1927年11月《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重要的”，党的责任是“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又说：“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这说明六大虽然批评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但是，仍然没有改变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

六大还指出：“农民的武装暴动只有在都市中革命潮流

高涨并受工人阶级指导的时候，才可能得着胜利。”这就是说，六大虽然提出了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问题，而且还把建立工农革命军作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但是，“六大”不过是把农村革命根据地看作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是服务于并服从于城市工人斗争的。而且认为革命潮流最准确最重大的特征，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周恩来指出：“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是经验还不够，还在探索。另外，“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曾经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也是不平衡的。现时的形势是：一方面许多省区之中农民运动往前发展，别方面在许多工业中心，工人运动受着极大的摧残。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情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当时指出这一点是很可贵的。但是，六大并没有对这一事关全局的问题做更具体的分析，更没有把革命发展不平衡问题与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联系起来，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李立三、王明的“左”倾错误还是走的“城市中心”的老路。追其根源，就是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照抄照搬俄国的经验。

从上述“城市中心论”出发，六大提醒全党注意：工人运动比较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现在阶段中之非常特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页。

别非常危险的地方，它必不可免地发生使党的工作路线离开主要的产业工人阶级的危险倾向，而倾向于破产农民、城市贫民和游民无产阶级。鉴于这种危机，六大号召全党，必须同轻视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建立党的巩固基础于工厂支部之上。

（四）“六大”在对革命策略的分析时指出：“虽然反动营垒之中，有很多很多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地主阶级的各派各系之间等等），这种矛盾往往弄到武装冲突和军阀的混战，然而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遇到中国劳动群众革命斗争的爆发，便结成联合战线来压迫。”这就是说，六大一方面承认反革命内部有种种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却强调反革命阵营的反共反人民的一致性，从而否认敌人的矛盾可以利用。

六大对于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其他党派，统统视为“反革命的派别”，不管是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还是邓演达、谭平山的第三党，都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专来到群众中散布许多蒙蔽阶级意识的迷药”。中国共产党对其任务，“就是指斥他们在反帝运动和民众运动中的动摇犹豫和妥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底奸细。”

六大对土地政策和农村阶级政策规定：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底土地财产，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这种“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只分给贫苦的农民，那就必然发展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或驱逐地主出苏区。这样对斗争是不利的。”①六大还强调了富农的封建性，指出决不能因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2页。

联合战线而对富农有让步，因为富农之走入反革命营垒是不可避免的。

六大还错误地决定，对于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并且已经参加革命队伍的土著武装组织，要视为土匪看待，他们的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也决不能位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井冈山上王佐、袁文才的悲剧，正是这一极“左”政策的产物。

六大不仅把反革命营垒看成铁板一块，对地主、富农也施之以过“左”的政策，甚至对经过改造，已经参加了革命队伍的土著武装的首领，也采取极端的制裁措施。六大还认为小资产阶级终至于投降到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营垒里去了，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变成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这样，六大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以“打倒一切”、“关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的革命策略，它同当时革命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客观要求是根本相悖的。

综上所述，六大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道路以及革命策略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党的“八七”会议以来“左”倾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六大虽然批判了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但是，它并没有肃清“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浓厚地存在着。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又为李立三、王明发展成了“左”倾冒险主义。

李立三的错误与共产国际

彭 塞

从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到同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结束了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却给中国革命造成不小的损失。对于这次错误，李立三负有多大责任？与共产国际有何关系？国内外都有不同看法。共产国际执委会1930年10月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以下简称三〇年十月来信）认为李立三是与国际“互相对抗和势不两立”的“反国际的政治路线”。似乎它与李立三的错误无关。有些学者又认为既然李立三的错误其理论和战略来源于国际，国际又是中国党的上级领导，那么李立三的责任就很小，甚至没有什么责任。前一种意见未免极端，后一种意见也不尽全面。本文想对这个问题做些研究，由此出发并对二战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党的三次“左”倾谈一点看法。

一、李立三是反国际路线的吗？

1930年9月结束李立三错误的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

会，根据国际执委政治局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认为李立三“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对形势的估量“有模糊而不正确的地方”、“有过分的估量”，以致引起“策略上的错误”、“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见《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虽然在国际执委《三〇年十月来信》的批评下，中共中央政治局1930年11月《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随之改变了看法，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其实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错误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国际执委《三〇年十月来信》改变了原来看法显然是别有原因的。

李立三绝不是反国际路线的。他和国际不仅“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和国际的指示无丝毫的不同，而且是完全一致的”。（见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李立三所犯错误的主要方面，都来源于国际，或者是受它的影响而产生的。

首先，对于形势的估计方面。形势的估计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决定任务的出发点，李立三对于形势的估计，完全来源于国际。1928年6月党的六大期间，李立三还没有摆脱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不断高涨”、“不断革命”的影响，认为当时中国各地都在不断发生工人、农民的斗争，革命仍是高涨的。经过斯大林的说服，会后他改变了看法。1929年3月，他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的《目

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中，认为“广大群众的斗争又已开始复兴的形势”，同时认为“如果现在群众斗争已经复兴了，将要很快的走向革命高潮，这也是极不正确的观点”。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政治决议仍持这种观点。但是，共产国际自从1928年六大提出“左”的第三时期理论以来，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愈来愈“左”，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最初尚认为是低潮。到1929年7月国际执委十次全会决议，便认为中国“革命浪潮的条件无疑正在成熟，必将导致苏维埃，成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这个决议传到中国，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2月通过接受国际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肯定“第三时期”理论和国际执委十次全会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就中国现在一般经济政治危机形势，也完全适合于这样的估量”，“表现着这一革命复兴的形势，要更迅速的开展这一全国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提出了一些“左”的策略和政治口号。1929年10月，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等迫切口号。接到这封信后，李立三主持中央政治局又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表示同意国际指示，认为“已进到全国危机时期”，是“革命浪潮的初期”了。以后，李立三便发出了许多中央通告，对形势估计愈来愈“左”。1930年2月七十号通告认为，“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

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展开。”同年3月13日七十一号通告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斗争，无疑的是成熟复兴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3月22日七十三号通告便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新的浪潮……无疑的是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五月他在《布尔塞维克》发表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左倾冒险主义的基本思想就已具备。六月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便通过了他起草的《决议》，把他的左倾冒险主义变成系统的党的决定。他认为“革命高潮已到了”。

（见他关于《决议》草案内容的报告）由此可见，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是亦步亦趋地根据国际指示来的。

或许有人会说，国际虽认为是革命高潮，但并未说是直接革命的形势，这毕竟是有区别的。然而李立三把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混同，也是受了国际的影响。1929年7月国际执委十次全会上，莫洛托夫就说：“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十二月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中也说：

“右倾派与调和派认为现在新的革命浪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好象有一座万里长城隔住，无疑的是极端错误的。”1930年2月斯大林在回答斯维德洛夫大学学生问时说：“不能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

“前者通常不知不觉地转为后者”。这话传到中国，无疑也会影响李立三。

其次，在“左”的策略和冒险行动方面。“左”的策略和行动，来源于“左”的战略。国际六大以来，对形势的估计过“左”，在国际共运中采取了“进攻路线”的“左”的战略，使中国党也从1929年7月国际执委会全会起开始